



1927年，毛泽东送给谭震林5支枪

4

历史纪实

宋国涛 著
人民日报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随着中国共产党各省委员会的建立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省委书记。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经受锤炼；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接管城市、建设民主政权、开展土地革命；他们带领群众恢复生产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战胜艰难险阻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。

本书介绍了彭真、黄敬、林铁、程子华、乌兰夫等29位开国第一任省(市、自治区)委书记的事迹，展现开国建国的巨大艰辛，启示人们更加珍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柯庆施是中国最早见过列宁的人之一。1952年，他成为开国后第一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。

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

1949年5月3日，谭震林率第7兵团攻入杭州，首先占领钱塘江大桥，迅速解放杭州。1949年5月6日，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，谭震林任省委书记。谭震林成为开国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。

1927年，谭震林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——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首任主席。毛泽东得知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了第一位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，十分高兴，立即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团政委宛希先送给谭震林5支枪，帮助建立茶陵地方武装。

谭震林很快组织了一支纠察队，并发动乡村成立赤卫队、暴动队，把茶陵的革命搞得红红火火。

年底，湘军第8军吴尚的一个加强团包围了茶陵，革命军游击队、赤卫队和纠察队一起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，为保存实力，革命军决定主动撤出战斗。在部队往什么方向去的问题上，革命军第1团政委宛希先和团长陈皓发生了严重的分歧，陈皓要把部队拉向湖南，企图投敌叛变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谭震林坚决支持宛希先将部队带回宁冈、井冈山进行休整的正确主张。

正在宁冈养伤的毛泽东接到宛希先的信，急速赶到湖口，逮捕了陈皓，挫败了陈皓等人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。

在湖口墟，谭震林第一次见到

毛泽东。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位大眼睛、厚嘴唇，个子矮矮的青年，笑了笑说：“哟，你就是谭震林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，好年轻喽！”他握着谭震林的手说：“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去，做个‘震山虎’吧！”谭震林出生在虎年，曾以“虎子”自命，毛泽东的话引得谭震林也笑了起来。就这样，龙归大海，虎踞山林，谭震林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。

茶陵是通往井冈山的门户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部队到了井冈山，毛泽东发现茶陵县委的人没有上山，于是找到谭震林，对他说：“震林，茶陵还是要管的，派你回去任茶陵县委书记怎么样？”

于是，谭震林带领部下秘密深入茶陵境内活动，一面积极与原县委联络。由于敌人加强了对茶陵地区的搜剿，县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被派下去的同志，被抓的抓，杀的杀，有的下落不明，工作开展不起来。但谭震林没有气馁，他决定要亲自去闯一闯虎穴。

可正当他准备行动时，毛泽东下令要他们立即撤回。谭震林问为什么，毛泽东说：“茶陵的情况很复杂，没有武装就不要去活动。”

谭震林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，他说：“从这件事体会到，没有武装就没有我们活动的余地。在茶陵，我们打碎了旧政权，建立了新政权，经验告诉我们，没有正规部队和广大地方武装配合，就不能战胜敌人，已经建立的红色政权也站不住脚。”

毛泽东说：“你也赞成要有武装啊？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人！”

原来，党内当时有不少领导同志对革命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

村，积蓄力量，实行武装割据，开展土地革命的战略思想认识不足，认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，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关。毛泽东曾因写过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小册子，遭到过许多人的责难。谭震林的话佐证了毛泽东“武装割据”的观点，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。

1928年3月，“左”倾盲动主义传入边界，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销，改任师长。部队被迫调往湘南，白色恐怖笼罩边界，一部分人看不到红军和“工农武装割据”的前途，感到“前途渺茫”，于是发出“红旗到底能打多久”的疑问。

谭震林以切身体会，态度鲜明地说：“什么红旗到底能打多久？反正我们手里有枪，没有被敌人夺走，红旗就能打下去，枪杆子越多，红旗就能打得越久。现实的例子就是王佐，他手里有枪，敌人对他没办法，他就能在井冈山立脚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，军阀割据，他们也都是依靠手里有武装。”

几十年后，毛泽东仍没有忘记谭震林对“武装割据”理论的支持，还经常对人说：“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是谭震林。”

还有一件有趣的往事，是关于《沙家浜》的。阿庆嫂的原型到底是谁？有一个流传最广的说法，认为阿庆嫂就是抗战时期的陈二妹。

阳澄湖地处鱼米之乡，人口比较稠密，村头街尾都有茶馆。这茶馆既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，也是农村中的社会活动中心。当时沙家浜一带有南桥茶馆、北桥茶馆、春梅茶馆、东来茶馆等等，离沙家浜稍远还有董浜的涵芬阁茶馆、古里的苏家尖茶馆、白泥翁的陆家茶馆等等。中

共党组织、广大革命群众就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芦苇荡中的战士密切联系。也有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就以茶馆老板的身份出现，这样和各种反动势力周旋更为方便。

涵芬阁茶馆和陆家茶馆是新四军两个主要的交通站，而且还直接掩护过战士。涵芬阁茶馆由陈二妹经营，丈夫陈关林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她起初不知道，直到陈关林被日寇逮捕而杀害，这才知道真相。陆家茶馆由陆二嫂经营，她丈夫不久脱产参加了武装斗争，也是牺牲在这一片土地上的。

“皖南事变”后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谭震林从上海回来要立即去李家坝新四军驻地，陈二妹即担任护送谭震林的任务。她打扮成回娘家的模样，走在谭震林的前面。突然，路边钻出两个特务拦住了谭震林。陈二妹敏捷地返身走过来，指着谭震林，装着气愤的样子说：“你这个人啊，就欠你10斤茶叶钱，盯来盯去怕我赖你的账？那跟我到娘家去拿！”说完，从竹篮子里拿出两包香烟和几个熟鸡蛋塞到两个特务的手里，两个特务经常到茶馆里喝茶，听了陈二妹的这番话，又看了看谭震林的商人打扮，就相信了。谭震林躲过一劫，顺利到达了新四军驻地李家坝。

后来，陈二妹在苏州、上海一带坚持活动，为新四军伤病员买药、买餐具，给他们烧饭、洗衣服，直到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。

1982年5月，谭震林旧地重游，来到阳澄湖畔的董浜，见到了还健在的陈二妹，因为京剧《沙家浜》早已风行全国，所以他风趣地说：“常熟有许许多多阿庆嫂，关林嫂不也是一个嘛！”

入读金女中无望，明德女中收了我

7

传奇人生

许燕吉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，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，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：不羨靓果枝头，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，尽力成为‘有用的人’，也很充实自信。”

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，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。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，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，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，其间的艰辛曲折、酸甜苦辣，称得上传奇故事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我们一路逃难，从澳门逃到了重庆。逃难过程中，还遇上了李四光夫妇。

日军终于投降了，我和妈妈来到了南京城。妈妈的工作在重庆时就安排好了，到了南京，马上报到上任，单位叫“儿童福利实验区”。

可能是美国没有料到日本投降来得这么快，运到中国的军需品不能再漂洋过海地运回去，便都给了国民政府，处理这批物资的机构叫“善后救济总署”。宋美龄正好结束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，便向善后救济总署分了一杯羹，创办了“儿童福利实验区”，名义上归社会部，实际上是宋美龄的事业。具体做工作的还是熊芷和熊芷手下原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那批干部，我妈妈也是其中之一。

实验区总部建在白下路。福利站的学生们都是老师们亲自家访收来的。他们的家长多是卖菜的、挑高箩(收废品)的、拉车的、蹬三轮的，总之都是供不起孩子上学校的贫苦劳动者。现在，福利站不收分文，教他们识字、念书、学手艺，每天还特别给他们吃一顿黄豆搅上固体植物油煮的大米饭，家长们没有不愿意的。

老师们除了教孩子们以外，还有做家访和社会调查的任务，造了表册，定期给贫苦家庭的婴儿、幼儿发放奶粉和面包，有时还发棉布。面包是善后救济总署给的面粉，由食品厂加工的，闻起来很香。我有一次赶上帮忙，心想发剩下我也解解馋，不料发了一上午，熏都熏饱了。我看孩子们吃那黄豆菜饭狼吞虎咽的，也想吃一碗，被妈妈严厉制止了。不过也沾过几次光，吃过几次冰激凌。发的奶粉中，有时会掺进几筒冰激凌粉，婴儿没法吃，站上就留着慰劳教职工。

第一福利站开学后，建在长乐路的第二福利站也成立了。妈妈兼任这两个福利站的主任，两边跑，但还住在第一站。那时，我和哥哥都住进了学校，星期天回第一站吃顿午饭，和妈妈见见面。

1947年4月4日儿童节，实验区和所属的两个福利站三“家”的小孩子在杨公井的国民剧院办了个不小的庆祝会，演出了许多节目。第一福利站的节目最多，孩子们歌唱得齐，舞也跳得够味。那天我也去帮忙，在剧场楼上维持秩序，目睹了那满堂喝彩的热烈场面。

庆祝会造成了很好的社会影响，第三福利站开始筹建了。第三福利站建在鼓楼渊声巷，与第一、第二福利站的简陋不同，它是按儿童的特点新建的，低台阶，低矮扶手，小舞台，花园操场，外观就像一座豪华的别墅楼。1948年底建成，还是由妈妈当主任。这下妈妈兼了三个福利站主任，实验区给她配备了一辆三轮车，一位男工老常蹬着车送她每天城南城北地跑。妈妈也不住第一站的狭窄小房了，搬到了第三站十几平方米的大房间。我也有了自己的床，和单身女老师们住在一起。

福利站办得红火，招来国民党特务的注意，他们径直进来质问：“小孩子唱的《大石桥呀要倒了》是什么意思？”妈妈说：“这是英国古老民歌《伦敦桥要倒塌了》译的，小孩子的游戏，全世界都流行，你们不知道吗？”

特务又说：“那一回你们就表演《朱大嫂送鸡蛋》，哪里来的歌，什么人教你们唱的？”妈妈就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教育部出版的音乐教材里就有，劳军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老师

都是按教材教的，有问题吗？”特务们悻悻地走了，不过常常有些可疑的人在福利站外面闲逛。解放后才知，《朱大嫂送鸡蛋》是解放区流行的歌，而实验区和福利站的老师中真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。

福利站一直办到解放后。熊芷随宋美龄去了台湾，熊芷曾动员我妈妈跟她走，还许诺送我妈妈去美国进修。可是我妈妈“领教”过国民党，坚定地等待着解放。现在，实验区是南京市第一幼儿园，第三福利站在解放初期是干部托儿所，现在是第三幼儿园。第一、第二福利站则痕迹全没了。孩子们解放后大都上了正规小学，有的还上了大学，当了教授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还来看望过我妈妈。老师们有联系的更多，可惜六十多年过去，也几乎都变成历史了。

我们到达南京已是9月中旬，学校上课都两周多了，同时复员到南京的人很多，各校皆满，问了几所学校都不肯接收。其实我并非勤学的好学生，但被排斥在校外也不觉得快乐。妈妈只好抽时间去找关系，讲情面。妈妈找到吴贻芳，她姨父陈叔通是我外祖父的至交，吴贻芳是在姨父家长大的，和我妈自幼相识。她说，她只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(金女大)的校长，女大附中另有校长，但答应给打个招呼。妈妈认为问题不大，让我自己去金女中报到。我到校时正是上课时间，室内外都安静得见不到人。我平时调皮捣蛋胆子不小，到这时忽然感到孤立无援，忐忑忐忑硬着头皮在教务处喊了声“报告”，进去说明了原委。教务主任是位中年妇女，态度和蔼，说我来得太迟了，教室实在挤不进去了，否则别

说是吴校长介绍，就是南开来的，金女中也是欢迎的，还顺水推舟地让我去附近的中华女中、汇文女中问问。我头一次出来闯就碰了这么个大钉子，也不懂得“死乞白赖”，鞠了个躬就出来了。正赶上下课，好几个南开的同学发现了我，围上来问这问那，以为我也进金女中了。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没有多停留，蔫头耷脑地走回去了。

晚上，妈妈回来知道了情况，她说：“实在不行，你去青岛上七娘的圣功女中吧！我送你到上海上船，七娘在那边接你，行不行？”我不假思索一口就说：“行！”没料到事情有了转机。原来，妈妈以爸爸的名义托过当时的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，因无多少交情也就没寄多大希望，却不知杭立武的内弟媳陈黄丽明是明德女中的校长，她居然答应收我入学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我们到南京之初，住在陈娘向她单位借的一间房子里，一直住了十几天，等福利站房子弄好才搬离的。陈娘叫陈蕙君，比妈妈小三岁，和我七娘同龄，世交之家，她们从小就是朋友、玩伴。妈妈的新朋友叫司晓南，比妈妈小八岁，胜利前她在战时儿童保育会任职，和我们一起乘船来南京，在儿童福利实验区工作，睡在我妈妈的上铺。

解放后才知道，司娘在北京上大学时和一位地下党员谈过恋爱，也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。后来那位地下党员被捕了，她翻墙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掌，但失去了组织关系，一直在白区从事教育工作，而且一直没有结婚。她于1992年病逝，四十多年来一直和我妈妈共同生活，互相照顾。